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胡国成 赵梅 主编

战争与和平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

K152-53

11150

战争与和平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
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胡国成,赵梅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1936-8

I. 战… I. ①胡…②赵…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纪念文集②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现代-文集
N.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3075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40千字 印数:1—1500册

定价:15.00元

序言：五十年历史的沉思

胡国成 赵 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整整 50 年了。50 多年前，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发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引起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民族和人民的空前反抗。近 50 个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为捍卫人类的尊严、民主和自由，相互支持、英勇奋战，经过悲壮惨烈、艰苦卓绝的战争，终于打败了凶残的敌人，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及其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为世界和平展现了光明的前景。1945 年 10 月 24 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共同制定的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为宗旨的《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由 51 个创始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宣告成立，人类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的世界，虽然经历了冷战和多次局部战争，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但联合国所确立的原则——和平与发展，却始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如今，反法西斯战争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联合国也已走过了它 50 年的历程。今天世界各地举行的隆重而盛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对战争的痛苦回忆和对死难者的怀念和哀悼，更有对世界的前途，即战争与和平的冷静思考。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美国研究》编辑部于 1995 年 1 月 19 日

联合举行学术研讨会。来自首都 21 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新闻界人士 50 余人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联合国的成立对战后世界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战后国际安全与秩序问题、以及德国和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等问题交流了观点和看法。讨论会分别由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和《美国研究》主编、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主持，整个会议的气氛坦诚而热烈，学者们有争论、有交锋，更有理解与交融。正如资中筠女士在总结中所说，高质量的论文及评论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会者一致认为，通过总结战后 50 年来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好地把握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讨论会后，学者们根据会上的各方意见，对自己的论文做了精心修改，由我们负责汇编成册，是为本书。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收入了几篇未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论文，为的是使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所涉及的论题更全面。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之前，在东亚大陆，中国人民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进攻，便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英勇抵抗。“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日本迅速占领我国东三省，并且扶植起由日本关东军操纵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日本军国主义者从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开始，发动了一场以吞并整个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在二三个月内便“了结中国事变”。然而，当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后，它才体验到了某种力不从心的滋味。在正面战场虽经几场恶战却频频得手的同时，在日军占领区的敌后战场上，它却遭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领导的敌后武装及占领区人民的顽强而灵活的抵抗和打击。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

洋大海，或如他们自己所说，陷入了一个“泥潭”，难以自拔。这期间，日本政府曾先后建立起最高统帅和决策机构——大本营，并发布了《国家总动员令》，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侵略战争，却仍难以最后取胜。在日军“为使中国迅速丧失战争意志”，而在中国的土地上野蛮、残暴、疯狂地大规模屠杀平民的同时，日本外交界则施展出纵横捭阖的本领，一方面极力诱降国民党政府，并在南京建立起以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另一方面则在国际上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为其以更大的军事冒险来摆脱侵华战争“泥潭”的所谓“南进”战略作准备。为了实施“南进”，日本一方面与苏联谈判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另一方面则与美国谈判，以求取得美方“谅解”。在日美谈判仍在进行之际（实际已破裂），利令智昏的日本军部采取了一个至今仍使战略学家感到迷惑不解的突袭行动——偷袭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由此而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主动地投入了陆洋两线作战的自杀境地，从而加速了自己的败亡。汪熙先生在《太平洋战争与中国》一文中分析了日本政府在陷入全面侵华战争的“泥潭”后，所采取的各项军事和外交行动，认为在这场它力所不能及的战争中，日本的当政者对形势的估计常常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决策的不民主是主要因素之一。

事实上，在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体制下，根本无所谓“民主”可言，法西斯主义思潮主宰了一切。法西斯军人随意杀戮他们不满意的上层人物、内阁大臣、直到首相的作法已使政界、财界的头面人物胆战心惊，更不必说对平民的镇压使普通百姓所怀有的恐惧感了。在这种情况下，军部成为实际上左右政局的主导力量，进而形成了所谓“举国一致”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的局面。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任何对侵略战争不利，甚至劝之慎重的言论已很难听到，从而使得日本当局一错再错，最终走向彻底失败。

汪熙先生认为，自从日本军国主义者感到自己陷入了侵华战争的“泥潭”后，其后它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均是为了从这个“泥潭”

中脱身。当然，这种脱身并非是想撤出中国，而是想变在中国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为主动，是要彻底“征服中国”。然而，这一目标却是它永远无法达到的。面对亿万坚决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和坚持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各种正义力量，日本军国主义者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逃彻底覆灭的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起，便已注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曾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时，抛出了所谓《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紧接着，在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谈判中，又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划定了范围，即“以日、满、华为骨干，包括委任统治地之原德属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其附属岛屿、泰国、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后来又将东西伯利亚包括进去。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后，曾解释说，日本追求的是“共存共荣”，而英美的亚洲政策是只顾自己繁荣。在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当天，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排除英美之暴政，使东亚恢复其明朗之本来面貌”。时至今日，在日本仍有人操着当年东条的腔调，说日本进行战争是为了解放东亚各国于英美暴政之水火。多么高尚的动机和事业啊！只可惜至今非但没有任何一个日本想去“解放”的东亚国家感谢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反而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异口同声地要求日本反省它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其实，只要看一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其占领地区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尚有理智的人都不难看透这种“共存共荣”的实质：“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细菌实验和细菌战、毒气战、掠夺、强征、奸淫、苦役……所有这些人类最野蛮的暴行构成了淌着血和泪的所谓的“共存共荣”。亲身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亚洲各民族和人民永远无法忘记这惨绝人寰的遭遇。

如果说现今日本的一些年轻人不知其情而否认“侵略”是由于

不明真像，那么，一些人、甚至一些上层的政治家篡改日本的侵略历史，否认日本曾从事过侵略战争则是出于有意的掩盖和欺骗了。在当今的日本，存在着对战争责任和现今日本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种种议论。多年从事日本研究的吕永和先生在《近年来日本的“侵略战争否定论”与新的“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详细地解释并分析了至今仍活跃在日本政坛上的头面人物的这些议论，特别是“侵略战争否定论”、“入亚论”的实质，并深入地探讨了日本否认侵略战争思潮的成因。他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后日本的这些否定侵略战争的思潮和政治倾向的产生和复苏，既有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经济环境为背景，更离不开促其滋生、助其成长的社会土壤：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构筑，为日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机遇；日本国内远未肃清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征伐思想及未得到应有惩罚的战争罪犯和旧军人则成为“侵略战争否定论”滋生的土壤和温床。王新生先生在《日本：一个缺少自省的民族》一文中集中分析了日本当前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日本战后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大国主义思潮和缺乏坚实的哲学和宗教支柱的日本文化。

在分析日本否认从事过侵略战争的原因时，两位学者一致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实施的民主改革因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半途而废，是造成今日日本不认真反省其侵略战争罪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史学界是有共识的。人们这样说，并无意将日本的不反省、不认罪的态度归罪于美国。毕竟，是日本犯下了侵略战争的罪行，是日本需要对之反省，需要认罪。但是，美国在确认日本战争责任及指导日本民主化改革中的某些作法的确起到了鼓励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保持沉默的作用。

美国为了排斥苏联在对日战后处置上的发言权，使自己在战后的政治版图中占据有利地位，不仅在战后初期以盟国名义单独

对日本本土实行了占领，而且在战争末期事实上修改了反法西斯国家一致赞同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允许日本在保留天皇制的条件下实行所谓的“无条件投降”。于群先生在《美国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问题》一文中，运用美国政府 70 年代后解密的档案资料，详细论述了美国面对日本“一亿玉碎”的本土决战的叫嚣，出于减少美军伤亡和排斥苏联染指日本战略需要，单方面修改及实施“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全过程。

在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美国占领当局又因与苏联争霸的需要，将日本视为自己的战略伙伴，逐步放松对日本战犯的惩处，最终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当时把朝鲜战争的爆发看作是苏联在幕后操纵的扩张自己势力的一步棋），完全放弃了在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接着，在对日媾和中，美国又无理地把对日战争中的主要参战国中国和苏联排斥于和约准备工作之外，并不顾其他一些参加对日作战的亚洲国家的反对，在日本法西斯势力并未彻底肃清的情况下，于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会，与日本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有这一切，都为日本后来顽固地坚持其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态度起到了客观上的鼓励作用。因此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美国是难辞其咎的。

日本的这种顽固地不承认侵略战争罪行的态度不仅引起了亚洲和世界人民的担心和反感，同时也对日本本身的国际形象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近来，日本鉴于自己对联合国在经费上所作出的贡献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要求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一要求似乎无可厚非，但至今未获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明确支持。这不能不说是与日本至今在战争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有关的。联合国的宗旨简言之，就是和平与发展。战后 50 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然而，仅凭这一点要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却是不够的。日本能否

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仍然是个未知数，亚洲各国对此普遍不信任。尤其是曾经野蛮地侵略过东亚各国的日本至今仍在否认自己曾进行过侵略战争，这不能不使遭受过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亚洲各国人民加重了担心，同时也对日本的这种态度感到失望。如果连自己所犯的侵略战争罪行都不能对遭受过这种侵略战争蹂躏的国家和人民坦率地承认并谢罪，如果把自己所进行的残暴的侵略战争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进入”，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今后在时机成熟、羽翼丰满的情况下不随便“进入”一下某个国家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亚洲各国是如此，对于日本也是如此。日本的当权者应该能够理解，只有真正地表现出诚意，彻底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才能取信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才能取信于世界人民。只有获得了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谅解，日本才能在世界上更有作为。人们期待着日本的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中美关系占有重要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战时形成的这种中美特殊关系，对战后初期中国的政治发展影响巨大。在《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陶文钊先生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他认为，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期，美国对华政策在逐渐由“不承认主义”向制日援华的方向发展。其间1941年的美日谈判及《日美谅解备忘录》，不过是美国为避免陷入两洋作战、推迟美日战争爆发而采取的策略，并非是妥协退让、苟且偷安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是由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统一、对美友好的中国作为它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扶蒋容共向扶蒋反共方向的转变，并非赫尔利个人的作用，而是美国决策者与中国国民政府领导集团在战时建立的特殊关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之一，是战时的盟国为了维护战后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促进人类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创建了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 50 年的实践中，联合国确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两方面目标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它本身也面临着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巨大挑战。回顾联合国创建的历史，从联合国概念的形成到它实际建立的全过程，正如资中筠女士在《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观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一文中所指出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主要体现的是大国的意志，并由此而产生了“美国领导”战后世界的模式。这与同时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是矛盾的。在冷战时期，大国主宰世界的观念受到美苏对峙的限制，并且遭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冲击。资中筠女士认为，不论对联合国当初创立者的理想和实践如何评价，显然它是昨天的产物，在新形势面前需要改革。由于综合实力、地理、历史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影响与发言权比其他国家更大仍是不可避免的，而完全克服强权政治也还是遥远的事情，因此，如何处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与实际上大小国家作用不平衡的矛盾将是联合国改革所面临的难题。

曾在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中任职的陈鲁直先生，根据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和潜心研究，在《联合国秘书长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具体实践所形成的秘书长职务的性质、权力及其在战后历史中、特别是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和有限性。他指出，冷战结束后，多年来困扰联合国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争夺也随之消逝。秘书长的作用需要重新规范，这涉及到不少新形势下的新

概念和新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在新形势下若要有效地发挥其政治作用，就需要处理好联合国与其会员国的关系、安理会与秘书长的关系、维持和平问题与解决人类福利及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

李少军先生在《评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分析了联合国成立与发展进程中美国所起的作用。他认为，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相当特殊，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之一，作为联合国的所在地，作为联合国经费的最大提供者，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联合国中，由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使得美国往往不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和体现自己的意图和意志。因此，美国对联合国的承诺往往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美国要维持它的世界霸权、履行它所承担的世界性义务，又必须依靠联合国这个任何其他组织所无法取代的具有有限的世界性权威的国际组织。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这种热不了也冷不得的关系模式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看来，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的这种两难处境仍将继续下去，它与联合国的这种关系模式也将维持下去。

联合国成立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便成为它的首要目标，其中，对核武器的控制及核裁军占有突出地位。战争末期，美国曾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这种有史以来爆炸威力最强、破坏力量最大的武器的问世，震惊了全世界。连率先研制出这种武器的美国，对原子弹在实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规模杀伤效果也感到后怕。由于担心别国研制出这种可怕的武器而对美国造成威胁，为了垄断核武器，保持核威慑，美国不仅对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的盟国英国保守核机密，而且想方设法要阻止自己的冷战对手苏联拥有核武器。1949年9月，当苏联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后，美苏双方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核优势的争夺，其间也贯穿着一系列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谈判。多年从事美国战略问题研究的吴展先生在《核武器的五十年》一文中，回顾了美苏间这一系列的争夺与谈判。他指出，尽管由于苏联的解体，美俄双方

在 1993 年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第二阶段谈判的协议，使两国核武器的数量削减了 $2/3$ ，但两国并无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思。因此，在近期内，核武器无望进一步削减或全部消除。但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和商业的国际化 and 全球一体化的发展，通过核战争来获取国家利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核威慑的作用也越来越小，所以，核裁军迟早还会进行下去，符合全世界人民愿望的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理想迟早总会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的 50 年来，世界上尽管局部冲突和有限战争不断，东西方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冷战，但总的来看，国际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世界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与和平的状态。在《霸权·秩序·规则》一文中，王逸舟先生从“霸权和平”与“霸权稳定论”的观念出发，分析了这种相对和平状态形成的诸因素及原因。他指出，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由于某个或某些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压倒别国的优势而成其为霸权国，它将一定的想法、原则向外投射，造成一种它有能力维持的国际体系；由于霸权国和国际霸权体系的存在，带来了政治的和平、甚至经济的繁荣和相互依存的发展；一旦霸权国衰退或消失，国际体系便发生紊乱，就可能出现大规模战争。冷战时代，对峙的美苏两极实力相对平衡，加之意识形态的束缚力和核武器的威慑力，使世界保持了一种“霸权和平”和“霸权稳定”。冷战结束后，西方战略家为稳定国际秩序，考虑的是实行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策协调，以制定出适用于新形势的国际规则。因此，在冷战后时期，仍然是大国的“安全共同体”支配着世界。尽管理想规制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但现实世界绝不是理想主义的天下，而是权力、利益之角逐与道义、平等之追求的结合。

联合国成立后的另一个主要活动便是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众所周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促进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没有良好的国际货币制度和金融秩序，就不可能使国际贸易和投资顺利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反法西斯战争已稳操胜券的形势下，美国开始规划战后世界的经济秩序。鉴于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教训，为了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保持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维持美国国内的生产水平和充分就业，美国决心建立一种由美国来主导的、类似金本位制的、币值稳定而又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金融体制。1944 年 7 月 1 日，包括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在内的 44 个国家和政府的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旅游地，举行了为期 3 周的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达成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从而宣告了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中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和美国的国际金融政策》一文中，毕生从事财政学和美国金融政策研究的陈宝森先生详细阐述并分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及该体系在 70 年代初瓦解的原因，以及 70 年代开始的世界货币多元化倾向及浮动汇率制的利弊。他认为，尽管与金本位制和黄金—美元本位的固定汇率制相比，浮动汇率制不能算是一种十分理想的世界货币制度，但它却是一种适应目前国际经济实力对比、利大于弊的办法，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90 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一些国家社会制度的演变震撼了世界，也引起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思索：苏联的经济制度已经崩溃，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也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人类社会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关系着世界未来的重大课题摆在了世人的面前。长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茅于軾先生在《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一文中，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未来经济制度的前景。他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和地球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将成为今

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必须对付的客观约束。市场机制下的效率、价格和科学技术可以成为克服稀缺性的有效手段。然而，却解决不了环境容量的有限性问题。这说明，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必然是能够克服稀缺性的市场制度与能够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非市场制度相互结合的一种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立足点或推动力很可能是道德觉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制度的出现。

三

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自身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战争造就了当今的世界，也造就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战后的世界经济版图中，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因战败而在经济上遭到毁灭性打击；战胜国英、法等国的经济也惨遭浩劫，苏联经济则在战火中遭受重大损失。唯独美国，由于远离欧陆战场，除了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受到一些直接的财产损失外，本土则安然无恙；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未遭战火袭击和摧毁的工业，使得美国能够充当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一得天独厚的环境加上千载难逢的机遇，使美国的工业在战争期间得以飞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加之美国最先掌握了威力无比的新式武器原子弹，到战争结束时，这个曾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已无可争辩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这场战争不仅塑造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塑造了战后的美国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政治发展》一文中，专门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青年学者金灿荣先生从战时及战后美国政治变化的轨迹中深入探讨了这场战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他认为，由于战

时大规模的征兵和劳动力的短缺，黑人和妇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加入了美国的社会生活，使政治参与过程中行为主体的范围扩大，进而使美国的政治民主得以扩大，并造成了 60 年代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战争也使战时盟国苏联成为战后美国的主要对手，从而使反共主义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生活的基调。此外，这场战争进一步扩大了美国政府的职能，使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空前增长。在对外政策方面，这场战争则使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影响全面下降，扩张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由此而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试图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力量活跃。这种状况使刚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感到了某种威胁。因为战时美国已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供应西欧地区，如果该地区经济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西欧各国不仅无力偿还战债，而且也无力进一步购买美国产品。这样，在战争期间扩张起来的美国工农业生产要进一步发展，便绝无可能。更使美国感到担忧的是，如果西欧经济长期凋敝，共产主义力量势必得势，已被美国作为未来国际政治中潜在对手的苏联则可能乘机向这一地区“渗透”，并获得成功。为了稳定西欧局势，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制度，抵制共产主义影响，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和自己的世界战略及欧洲战略出发，于 1947 年 6 月抛出了以“复兴欧洲”为表面目标的战略计划——“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经与西欧 15 国及土耳其磋商，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由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战后的经济复兴；作为条件，受援国须用此款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商品，并接受美国对美援使用的监督，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尽快撤除相互间关税壁垒，保障美国私人投资的权利，向美国提供战略物资，放弃国有化计划，设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基金”，实施美国所要求的经济政策等。从 1948 年 4 月美国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并为其拨款开始，至 1952 年该计划结束，美国共向西欧各国提供了约 130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近 90% 是无偿援助。到该计划结束时，西欧经济明显复兴，受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在 4 年间增长 15-25%，工业生产比 1938 年增长近 40%。

作为美国战后初期最重要的一项战略计划，“马歇尔计划”基本达到了其最初的战略目标。它不仅帮助复兴了西欧经济，推动了战后西欧经济合作及一体化进程，同时也“遏制”了苏联向西欧的“渗透”。然而，它 also 造成了东、西欧的分裂，并使美国从此深深地卷入了欧洲事务。青年学者毕健康先生在《关于马歇尔计划决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通过对“马歇尔计划”的酝酿到该计划正式实施这一决策过程的认真考察，揭示了战后初期美国制定的这项战略计划的真实目标及美国与西欧各受援国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为我们理解战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在世界同声声讨半个世纪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反和平、反人类的血腥罪行的同时，人们普遍关注着 50 年来并未销声匿迹的法西斯阴魂的动向。在日本，人们已经看到主要是由于政府不能正视战争责任问题而导致的旧的法西斯势力的活跃及社会上种种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辩护的奇谈怪论；在德国，尽管联邦政府严厉禁止，但纳粹主义却阴魂不散，并在战后新的形势下死灰复燃。战后时期，德国不仅出现了新纳粹组织，而且，其活动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涨落，时隐时现，从未停息。近年来，德国新纳粹组织的暴徒多次袭击难民营，捣毁犹太人墓地和教堂，焚烧外国劳工住房，杀戮外国人，制造了种种排外暴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忧虑和不安。在《德国新纳粹主义组织活动剖析》一文中，多年从事德国法西斯主义研究的邸文女士运用最新资料，详细描述并分析了战后德国新纳粹主义组织的发展、活动及这类组织产生的原因。她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造成了新纳粹组织滋生的土壤；战后初期德国经济状况不佳，成为新纳粹组织产生的催化剂。尽管新纳粹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但